



群体·社会丛书
QUNTI SHEHUI CONGSHU

清代湖北义学研究

QINGDAI HUBEI YIXUE YANJIU

冯 明 著

明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群体·社会丛书
QUNTI SHEHUI CONGSHU

清代湖北义学研究

QINGDAI HUBEI YIXUE YANJIU

冯 明 著

明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湖北义学研究/冯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 5161 - 4343 - 8

I. ①清… II. ①冯… III. ①地方教育—教育史—研究—湖北省—清代 IV. ①G52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294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特约编辑 李舒亚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3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34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课题研究资助: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湖北义学研究”(项目编号:2011LW008)

黄冈师范学院博士基金项目“蒙养造士,化民成俗:清代湖北义学与地方社会”
(项目编号:2012029703)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省级重点(培育)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基金

丛书总序

1978—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然走过了整整三十个年头。思想的不断解放、观念的不断进步、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今日之中国与三十年前之中国几有天壤之别。变化无时不有，变化亦无处不在。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历史学。回首过往的三十年，中国历史学在承继前代之功与反思旧有之弊中不懈前进，其变化为学界有目共睹。一方面，史学走出“家门”，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中国史学已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史学遵循自身发展的轨迹，不断演化着学术转型，寻找本土化的学术路径。其中，一个巨大的成就令人瞩目，这便是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社会史的崛起。

社会史研究在中国之兴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文化大革命”之后再度复兴，此已成史学界之公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迄今，三十年的历程，中国社会史完成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过程，其成就不言而喻，伴随着社会史领域一批优秀成果的推出，一批学人迅速成长、成熟，开放的学术心态、广阔的学术视野、良好的学科素养、明确的学术目标、新颖的研究视角、多维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则使得这个领域弥漫着浓烈的对话氛围和创新意识，充满着勃勃生机。

面对史学领域的变化和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欣喜之余，静心思考，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明晰，以下几点应是目前社会史研究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其一，社会史秉承“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坚持写出“底层的历史”，无疑是符合这一领域学术研究主旨的，但一味地、长期地目光向下，排斥对国家政治以及精英层面的关注，则有可能使社会史的研究矫枉

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将社会史研究引入误区,犯下与传统精英史学相同性质的学术弊病,即重视一端,忽视一端,形成学术视阈中的盲点。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与学术素养,任何群体、阶层、领域都应该是其研究的对象。

其二,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态势之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失衡现象也越来越突出。我们姑且以“优势区域”和“弱势区域”来做简单的区分。前者主要是指研究力量雄厚、主流学者云集、成果积淀深厚、资料发掘充分、视点广泛、视阈开阔、学术对话频繁的研究区域;后者与前者相比则反差甚大,门可罗雀、稀疏冷清,学术界关注不足。这种现象的存在,直接影响社会史研究的区域对话以及社会史研究整体目标的实现。

其三,社会史研究十分强调多学科交叉与渗透,因而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便显得特别重要,这是社会史研究“科学化”的关键所在。然而,今天的社会史研究对于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仍是有限而不足的,多数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基本没有体现出作者的学科素养,对某些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也仅仅是停留在表层,如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田野方法的运用,只在于收集资料,体验与观察则完全忽略。

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明清社会史的研究,围绕博士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规划选题,潜心布局,以团队的形式共同致力于社会群体与地方社会力量的研究,已具备很好的研究基础,并围绕这一主题,完成了一系列相关课题的研究,同时后续的纵深研究正在进行之中。这个团队的学人已分布在各地各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立志长期围绕“群体·社会”这一大的主题展开不断的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试图对于上述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索。比如,在研究对象的区域选择上,尽量加强对于“弱势区域”的关注;在研究对象的群体选择上,尽量关照各类群体,尤其是学术界关注有所不足的群体。

这套丛书分为两大系列。一是群体研究系列。丛书中所确立的群体研究对象,当为广义的社会群体,群体特征大体为具有身份一致感和共同利益的人群,且以研究的问题为中心,将群体设定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既包括社会上层,也包括社会下层,同时,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诸如皇帝、阁臣、言官、翰林、地方士人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皆为丛书的主要研究

对象。而明清社会群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则是各群体研究重点探讨的问题。二是地方社会研究。我们力图打破传统史学追求宏大叙事风格的研究路径，通过对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明清社会的理解。选题将涵盖地方社会秩序、地方公共事务、地方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揭示明清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关注国家、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法规、行为举措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地方各领域与社会变动的关系，前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关联问题，其中，不少问题的考察将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联系起来。

丛书的主旨在于学术创新，或从新的视角、领域，或以新的方法、观点，表达一种真正的学术追求。在研究方法上，追求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分类，追求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方向，力图展现具有特色和深度的学术研究。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有着一个愿望，就是能让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结论具有更多地参与国内、国际学术对话的可能，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当然，也期望求得方家指正。

吴 琦

2008 年 12 月

于武汉桂子山

摘 要

本书以清代湖北义学为中心，旨在探讨义学本质，以及由此所反映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义学，是向贫寒子弟或少数民族地区子弟提供免费基础教育的慈善学校。学界对义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区，强调它作为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融合手段。

厘清义学概念和对清代湖北义学进行系统梳理后，在形成相对完备的统计资料基础上，可知湖北义学发展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个阶段。在湖北东部与中西部、城镇与乡村、府州治与一般州县治之间都存在显著空间差异。

在清代湖北义学运营中，教学设施是重点，教学管理是核心，教学经费是关键。在这些方面，湖北呈现出较大灵活性，经费筹措颇有特色。

清代湖北义学是国家与民间共同关注的慈善教育事业，它们在其中的角色与地位各不相同。根据官民参与的方式和程度，可将湖北义学分为官方主导、官民合作和民间力量主导三种模式，每种模式有若干典型案例。

清代湖北义学立足地方，服务地方，对地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义学在城乡广泛建立，推动了地方教育普及，尤其是促进了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还在一些地区改变了民风士习，发挥了社会教化的作用。当一些地区发生地方叛乱，威胁社会秩序时，民间力量迅速崛起，成为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和保持地方稳定的主体力量。

清代湖北义学基本功能是社会教化和人才培养，经过分析发现，义学的社会教化比人才培养效果更为显著。

由于清代国家政策鼓励和地方官员倡导，以及传统的积善成德、因果报应等慈善观念影响，民间力量对发展义学的参与程度日益提高。清代湖北义学由民间力量推动产生，随着官方逐渐介入，民间力量逐步处于官府控制下，长期居于从属地位。官方对义学控制日益增强，一些强制性规

定,越来越使义学的自愿性和慈善性受到削弱,逐渐脱离了义学发展本质,这是清代湖北义学不可忽视的一面。

关键词: 清代; 湖北; 义学

Abstract

This book focus on the Charitable Schools of Hubei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purpose of discussing its n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and society. The Charitable Schools provide free elementary education for children from poor families or the minority areas. So far, the academic study of Charitable Schools mainly concentrates on the southwest area of China, in which these schools were used as the cultural means to govern the minority areas.

After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the Charitable Schools, I studied the evolution of Charitable Schools of Hubei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se ample statistic information, we kn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itable Schools of Hubei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experienced five stages. During these stages, the spac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mid – west, the cities and the villages, the capitals and general towns in the whole Hubei province are notable.

Among the operation of the Charitable Schools of Hubei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teaching facilities, management and funds are the key factors. These factors exhibit more flexibility in Hubei, especially in funding the charge for the teaching.

The State and the civilian both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ritable Schools of Hubei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y play different role and are at different status in it. According to the way and the degree of their participation, the Charitable Schools of Hubei Provi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tterns, which are led by the official, led by both the official and the public force, or led by the public force. Each model has some representative cas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Charitable Schools in Hubei province made cer-

tain effect on the society. The broad building of Charitable Schools promo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in Hubei, especially in the minority areas of west region in Hubei. It also changed the custom of folks and scholars in some regions. When armed rebellion appeared in certain region, the non – governmental forces would grow up rapidly, and become the main force to defend social order and keep the social stability.

Unde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advocacy of local official,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notion, the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populace into the charitable schools gradually increased. Although the Charitable Schools of Hubei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came into being by the populace promo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gradually involved in, the populace became under controlling of the official, and stayed in the subordinate posi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government gradually strengthened the controlling of the Charitable Schools. On the other hand, many mandatory provisions weakened the spontaneity and charitableness of Charitable Schools, which made Charitable Schools deviated from its nature. I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aritable Schools of Hubei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Hubei, The Charitable Schools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缘起	1
二 研究现状	2
三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与方法	17
第一章 清代湖北义学发展概况	19
第一节 义学概念与源流	19
第二节 清代义学	24
第三节 清代湖北义学的时空分析	31
第二章 清代湖北义学的经营	52
第一节 义学建置与教学设施	52
第二节 教学管理	61
第三节 教学经费	75
第三章 清代湖北义学中的官民互动	87
第一节 清代湖北义学基本类型	87
第二节 官方角色与地位	91
第三节 民间力量角色与地位	101
第四节 官民参与的几种模式——若干个案分析	112
第四章 清代湖北义学与地方社会	118
第一节 义学与地方教育	118
第二节 义学与地方民风	123

第三节 义学与地方社会秩序·····	125
结语·····	131
附录·····	133
一 清代湖北义学设置情况·····	133
二 清代各朝湖北各州县义学分布·····	161
三 清代湖北部分义学经济状况·····	164
四 襄阳府义学章程十条·····	186
五 光化县义学约规十条·····	189
六 发劝设义学告示檄·····	191
七 劝谕广设义学示·····	192
参考文献·····	194
后记·····	210

绪 论

一 选题缘起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思想，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和条件来接受学校教育。因此，早在东汉，我国出现了一种面向贫寒子弟，提供免费基础教育的慈善学校——义学。从此，义学发展从未间断，至清代达到顶峰。

义学，或由政府、个人、家族独自创办，或由官民合办，是属于国家正式教育系统之外的公益性学校。多数义学以社会教化、稳定秩序为主要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教育范围，让更多人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使大部分人获得一技之长，得以安身立命。有少部分禀赋聪明、勤奋刻苦的人，通过科举步入仕途。

清代是我国义学发展的繁盛时期，从边疆到内地，各种义学在城乡广泛建立。作为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重视以教辅政，对义学发展颇为关注，注重其教化作用，以达到化民成俗和长治久安的目的。各种义学的兴办，在一些地区起到了开风气和正风俗的作用，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

清代湖北文教较为兴旺，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义学，作为传统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省一些地区颇为兴盛，对这些地区儒家文化普及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鄂西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明显。

目前对清代湖北义学研究还比较薄弱，为了尽可能反映清代湖北义学状况，对各州县义学数量和分布等加以核定，有必要广泛辑录各种义学相关资料，确定合理标准。笔者以《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为主体材料，参考实录、通考、会典及一些文集等文献，梳理其中义学相关

内容,力争通过对清代湖北义学时空分布、运营状况解析,从中探寻官方和民间力量在义学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义学与地方社会的相互关系。

二 研究现状

清代湖北义学研究涉及教育史、湖北地方社会和义学等方面。目前,学界系统研究清代湖北义学的成果不多,现简要回顾教育史、湖北区域史和义学研究动态,分述如下:

(一) 教育史研究

科举制度和地方教育为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地方教育包括蒙学、社学、私塾、书院等。下面简要介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科举制度和地方教育的部分研究成果:

1. 科举制度研究

科举制是我国古代选拔官员的重要考试制度,肇始于隋,定制于唐,发展于宋,兴盛于明,废除于晚清,对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等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度研究经过了奠基(1920—1949 年)、中心外移(1949—1979 年)和兴盛繁荣(1979 年至今)三阶段,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日益形成了“科举学”。^①

科举制度整体研究。王炳照、徐勇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研究》是一部综合性专著,采用专题式研究,兼顾历史演进的线索,详细分析了科举制演变的外部条件与内在机制,以及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学校教育和社会风气的关系,介绍了清末新旧教育体制的变迁。^② 商衍鎏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详细介绍了清代科举三阶段的各种考试,对考生资格,考官情况,考试地点,各项制度、规定以及考试方针有详细叙述。^③ 美国学者艾尔曼考察了中华帝国晚期的科举制度,指出科举考试是朝廷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与士人生活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之一,把科举视为现代化

① 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3 期;《科举学的起承转合——科举研究史的千年回顾》,《社会科学战线》2013 年第 7 期。

② 王炳照、徐勇:《中国科举制度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商志馥校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的障碍是一种误识。科举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帝国在政治方面再生产出了官员、在社会方面再生产出了绅士、在文化方面再生产出了文化主义和意识形态，三者以科举为中心，相互依存，共同维系帝国的空间稳定。^①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系统论述其倡导的“科举学”的含义、内容、结构等，阐发和梳理科举学学理与学术史，为科举学建构了一个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②

科举制与学校教育密切相关。赵子富指出，明代学校、科举制度作为高度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下的产物，不利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形式的发展。学校、科举制度的推行，读书人数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普及和文化传播。^③ 吴根洲认为，科举社会中，面对共同教育市场，官学不振客观上促进了私学蓬勃发展，科举制造就大批士人充当教师使私学大发展由必要变为现实。^④ 田建荣则认为学校与科举合流后，科举推动了地方官学的发展和普及，地方官学所具有的人才培养和教化推广功能促进了地方文教的兴盛。^⑤

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科举制存在地域差异性。徐晓望指出，科举制导致了东南地区文化普及，促进出版业发展、学校建设、理学发展。^⑥ 贾伟、李臣玲通过对明清时期青海科举人物以及官吏数量的统计分析，认为青海科举人物与官吏籍贯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外省科举人物对本省科举人物有重要影响。^⑦ 李良品、崔莉归纳了三峡地区科举时代教育与人才呈现出整体落后性、区域差异性、人才中心的变异性、教育发展的渐进性等特点。^⑧ 丁蓉对明代南直隶举人籍贯按县和散州统计后发现，主要

① [美] 艾尔曼：《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谢海涛编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②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赵子富：《明代学校、科举制度与学术文化的发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④ 吴根洲：《科举制对中国私学的影响》，《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⑤ 田建荣：《论古代地方官学与科举的关系》，《考试研究》2013年第4期。

⑥ 徐晓望：《论科举制度与中国东南文化的开发》，《东南学术》1998年第4期。

⑦ 贾伟、李臣玲：《明清时期青海科举人物史》，《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⑧ 李良品、崔莉：《三峡地区科举时代的教育发展与人才分布》，《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分布在华亭、武进、常熟、长洲等各府府治和一些经济繁荣、文化积淀深厚的县，从侧面反映明代科举分布的真实情形。^①

科举制度主体是广大士人，他们来源广泛，境遇不同，形成不同群体。张杰《清代科举家族》是首部系统研究清代科举家族的专著，以《清代朱卷集成》及相关文献为基础，借鉴当代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的理论和方法，对试卷进行抽样，指出在科举考试表面公平之下，科举家族的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对科举教育的重视和科举家族联姻的文化背景成为科举家族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② 蒋金星、肖夫元还从《清代朱卷集成》中考生履历计算贡生、举人、贡士（进士）平均年龄。根据年龄与人们智力和能力之间的关系，得出科举考试包含一种考查人们智力的成分，并非全靠死记硬背就能奏效的新认识。^③ 刘海峰指出，中末科会试和殿试已从古代选士考试制度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已具备一定现代文官考试性质。^④ 李世愉从落第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历代对落第士子政策、社会对落第士子态度、科举制度对落第士子所起作用等进行考察，指出落第问题处理好坏关系科举制度实施情况与社会稳定。^⑤ 田正平以《朱峙三日记》为中心，考察了朱峙三对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私塾生活变化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近代学校制度建立之初新旧杂糅、中西并陈现状的独特体验等。^⑥

2. 地方教育

（1）蒙学研究

蒙学，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我国西周前已出现，经过宋代发展，明清进入繁盛时期。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蒙学关注增多，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总体研究、断代研究、区域研究等。^⑦

① 丁蓉：《明代南直隶各县举人地理分布的考察》，《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

②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蒋金星、肖夫元：《清代举子中式年龄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

④ 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⑤ 李世愉：《科举落第：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探索与争鸣》2007 年第 3 期。

⑥ 田正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另一类解读〈朱峙三日记（1893—1919）〉阅读札记》，《教育研究》2012 年第 11 期。

⑦ 曹亚娟：《二十年来蒙学研究综述》，《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1 年第 9 期。